

导 论

0.1 综合经济利益研究的对象与任务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熙熙攘攘的人们为满足需要、为利益而奔忙。需要和利益并不是人类的特质,人类有别于动物的需要和利益是它的多样性、矛盾性和综合性。人类经济活动所追求的不仅是单一的经济利益,而且是综合经济利益。

一、综合经济利益素描

对于一个经济主体(比如个人)来讲,他所面对的经济利益的客体形式多种多样,不仅有物质的,还有精神的 不仅有实物的,还有价值的 不仅有时间的,还有空间的 不仅有物质财富的,还有权利的,等等。对他来说,尽管有可能每一种经济利益都是多多益善,但他获得某一种经济利益的多少却要受到其他客体经济利益的约束。没有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会因为某一种客体利益而放弃其他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客体利益。他要对许许多多的经济利益作出选择,他要在纷纷繁繁的经济利益中求得平衡。他所追求的是综合经济利益——各种形式经济利益耦合——的最大化。

一个人谋取客体经济利益似乎可以纯粹是他个人的事，纯粹是一种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但是，任何一个人谋取经济利益都要受制于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任何一个人的经济利益都是在与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的耦合中实现的，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一个人追求的可能是个人利益，但实现的却是综合经济利益。个人所能获得的综合经济利益的大小，不仅仅是个人努力的产物，更主要的决定于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的耦合，各种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的耦合是他们相互之间经济博弈的结果。为了获取最大化的客体综合经济利益，各经济主体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进行着不断的经济博弈。于是，各种形式的综合经济利益就呈现到了我们的面前：客体综合经济利益、主体综合经济利益、社会生产过程综合经济利益、时间综合经济利益以及空间综合经济利益等等，这些都是人们追逐的对象。

由于不同的经济主体所占有的经济信息量的多少不同，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拥有的经济权力的大小有别，使得不同的经济主体所能分享或所获得的综合经济利益的质与量也是不尽相同的。多种形式、多层次的经济利益耦合的结果，有和谐的综合、统一的综合，亦有对立的综合、冲突的综合。

当今世界，利益纷纭。经济利益和谐与统一的综合与对立与冲突的综合所带来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马克思说“这个世界之所以充满危险，是因为世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天下”，^①各种形式经济利益之间的相互冲突、对立会引发经济的波动与停滞；这个世界之所以也充满希望是因为人们在努力创造条件使天下许许多多的利益趋于均衡，各种形式经济利益之间的和谐、统一又会带来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经济利益犹如潘多拉盒子，打开后既将一切灾害与罪恶抛撒在世界上，也给人类以希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4—165页。

经济的波动抑或稳定、停滞，抑或发展，就取决于各种经济利益的耦合状况——各种形式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冲突与对立还是和谐与统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就是要使各种形式的经济利益在冲突中达到和谐、在对立中实现统一，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和持续发展。简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实现综合经济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综合经济利益研究的缘起

在理论上，经济利益已为人们所关注。但是，综合经济利益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综合经济利益是一个较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概念。我对综合经济利益的研究是经济利益研究的自然延伸。我对经济利益研究的兴趣产生于1980年代对农村经济改革的几次调研。我曾于1984年到福建闽北地区农村作调研，1985年和1986年两次到浙江温州地区农村作调研。在调研中我发现，农村经济的发展是由生产资料经营方式的变革所带来的，而经营方式变革的依据在于客观的经济利益关系。1985年我以“我国农村经济的动力结构”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把经济利益关系和自然技术关系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中介结构之中，构筑经济动力结构的理论模型，用以解释农村经济的发展。尔后，我进一步对这个理论模型进行改进，用以解说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即微观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当我从经济利益关系的视角去观察我国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时，发现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是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中介结构中经济利益关系与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共同作用。于是，我又提出了另一个经济动力结构的理论模型。^①不管在哪一个理论模型中经济利益都是其中的最基本的要素。所以，经济利益一直是我理论思考和现

^①余政：《论经济动力结构》，载《中国经济科学年鉴》1989年卷。该文只是初步提出了经济动力结构的理论框架。

实研究的主线。

综合经济利益范畴是我在导师的综合经济观^①的指导下，跟随导师在综合生产力研究和多形式、多层次的经济利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1994年起我有幸师从洪远朋教授，得以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较为系统地学习和研究经济利益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有关理论与实际问题。除了参加导师的有关课题研究，我承担了原国家教委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和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使我进一步拓宽了理论视野和丰富了现实研究的空间。在研究经济利益过程中我发现：任何经济主体追求的都不是单一的经济利益，而是各种客体经济利益的耦合；任何一种经济主体的综合经济利益都是与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的耦合中实现的；一种合理的经济体制应该体现综合经济利益关系的要求，经济体制是综合经济利益的制度形式。所以，综合经济利益是经济稳定运行、持续发展的动力。

于是，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实现经济的发展不能不讲经济利益，要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不能只讲经济利益而要讲综合经济利益。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认为，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内在的，经济只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是社会和人的需要，而且之中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还包括每个民族的价值及传统相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需要。^②

三、综合经济利益：历史的结果

人类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大体上经历

^① 洪远朋：《我的综合经济观》，载《我的经济观》第3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参见弗郎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了从追求混沌的经济利益，到单一的经济利益，再到综合经济利益的过程。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所追求的是与自然利益和社会利益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利益，是一种混沌的利益。商品经济使经济利益日益分化，多种形式的经济利益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随着科技进步，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加强，综合经济利益遂成为人们的对象。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乃经济利益使然。经济利益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讲经济利益，经济发展就会失去动力，经济就会落后。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看，讲“利”者似也不乏其人，如商鞅，他认为追求名利是人的本性。每个人“生则计利，死则虑名”（《算地》）；“民之于利”就像“水之于下”；“四旁无择”（《君臣》）。又如荀况，他认为“义和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大略》），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是一样。义是名，利是实。实是第一性的，而名是第二性的。“人生而有欲”（《礼论》）。人天生就有生存的欲望，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荀况的学生韩非也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以每个人的自利为基础的，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西汉的司马迁主张的是以利为基础的义利观，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满足利欲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礼义是为调节人们的利欲不使争乱而提出的。然而，有影响的讲“利”者毕竟还是少数人，而且他们的观点只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如秦朝）曾占据统治地位。

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不能不说与中国自汉以降不重视经济利益的儒家思想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有关。孔子“罕言利”（《子罕》），孟子干脆说“何必曰利”，认为国君、大夫、士和庶人都不应追求经济利益。汉代的董仲舒更把它推向极端，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仲舒传》》中国人在朝推崇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在野信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道家思想。讳言经济利益尤其讳言个人经济利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经济利益动力,这是致使中国经济长期驻足于自然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军事、文化等利益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服从于政治利益,是政治利益的附庸。因而,经济的发展往往服从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独立形态的经济利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经济利益开始从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和文化利益等等中分离出来。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中心,成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化的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经济利益主体不仅追求多种形式的客体经济利益,而且追求多种形式的经济利益和空间经济利益;不仅追求经济过程结果的利益,而且追求经济过程本身的利益。经济利益主体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和经济利益客体一定程度的多样化有利于建立起具有竞争机制的经济体制。但是,如果经济利益过分分化,各种经济利益形式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矛盾、冲突、对立甚至激化的状态之中,形成利益纷争的局面,那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充满危险”了。经济的发展会因为动荡、危机而难以为继。追求单一形式的经济利益所能带来的只能是经济的短期发展,经济的持续发展则要以综合经济利益为动力。现代社会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既不能不追求经济利益,也不能追求单一的经济利益,而应该追求综合经济利益。

人类所追求的经济利益经历了从混沌、分化到综合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利益是混沌的,它与政治、社会、文化等利益交融在一起;第二阶段,经济利益从政治、社会、文化利益中分离出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自身又不断分化,形成多种多样的经

济利益形式；第三阶段，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各种形式经济利益趋向于综合。

经济利益从政治利益、社会利益、文化利益中分离出来，进而经济利益自身也分化成了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这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市场机制是经济利益的分化机制。同时，市场机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各种经济利益的综合，它又是经济利益的综合机制。但是，市场机制的经济利益综合功能较为微弱，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经济利益的分化可以造成众多的富有活力的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综合则可以形成各种经济主体相互关系的秩序。传统的市场经济，由于过分讲求个体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未能有效实现经济利益的综合，经济虽然有活力但往往无秩序，致使经济运行波动、危机。

计划机制是经济利益的综合机制。计划经济的本意是企图用计划机制来替代市场机制，更好的实现各种经济经济利益的综合。然而，计划机制几乎不具有经济利益的分化功能，由于片面强调集体利益而不能有效兼顾个体利益，导致计划经济的经济主体单一，经济虽然有秩序但缺乏活力。

总之，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企图用计划机制将各种形式的经济利益均衡为综合经济利益；在传统市场经济条件中，人们企图用市场机制将各种形式的经济利益均衡为综合经济利益。然而，东、西方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单一的计划机制或单一的市场机制都无法实现理想的经济利益的综合，无法实现各种形式经济利益的均衡。只有把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实现综合经济利益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和持续发展。

综合经济利益是国民经济有序运行与持续发展的动力。无论是个人、企业、国家，还是别的什么经济主体，都不仅追求单一的经济利益，而且追求综合经济利益。它们所追求的经济利益有多种形式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实物利益和价值利益、时间利益和空间

利益等等。经济主体对各种经济利益客体形式的满足要求保持一定的均衡。一个人幸福与否在于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绝对量的大小，更在于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相均衡的量的大小；一个企业成功与否要看单个经营者的利润、单个所有者的利息或单个劳动者的工资，更要看经营者、所有者和劳动者相均衡的收益量的大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要看物质财富的多寡、价值量的大小，但更要看物质与价值相均衡的利益量的大小。总之，当个人能实现综合经济利益时，个人就能富裕幸福；当企业能实现综合经济利益时，企业就能够兴旺发达；当国家能实现综合经济利益时，国家就能够繁荣富强。反之，如果个人不能实现综合经济利益，个人生产劳动就没有持久的动力；如果企业不能实现综合经济利益，企业经营就没有持久的活力；如果国家不能实现综合经济利益，国民经济就不会有持续的发展。

综合经济利益是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但它要成为现实必须有相应的经济体制保证。能够实现综合经济利益的经济体制是人类理想的经济体制。换言之，人类理想的经济体制是综合经济利益的实现形式。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或者说革命之中。这场改革或革命成功与否就看能否实现综合经济利益，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和持续发展。所以，综合经济利益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

总之，由自然经济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古今中外的经济实践表明：人类不能不追求经济利益，也不能只追求单一的经济利益，而应该追求综合经济利益。经济理论的生命源于经济生活，综合经济利益是历史的结果。

四、综合经济利益：理论的必然

古往今来的经济学家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综合经济利益范畴，但综合经济利益却是他们一直在苦苦寻求的。

不可否认，经济利益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所以，经济利益始终是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从经济思想史上看，有亚当·斯密的个人利益，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利益，马克思的阶级经济利益，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利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利益和萨缪尔逊的混合经济利益等等。虽然他们选择的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各不相同，但他们探究的同样都是经济利益的综合。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以个人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经济利益的综合。斯密认为，个人经济利益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综合为社会经济利益。

李斯特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以国家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经济利益的综合。李斯特认为，个人经济利益首先要通过经济的或政治的各种手段综合为国家经济利益，然后再综合为社会经济利益。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以阶级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经济利益的综合。马克思认为，综合经济利益的形成是经济制度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经济利益所能综合成的最高经济利益是阶级经济利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利益的综合是一种失衡的综合，真正的均衡的综合要以公有制为前提。

马歇尔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以微观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经济利益的综合。马歇尔认为，个人经济利益只要通过市场机制在单个企业与单个市场中的微观综合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利益。

凯恩斯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以宏观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经济利益的综合。凯恩斯认为，微观经济利益综合为宏观经济利益只有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作用才能实现。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以混合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经济利益的综合。萨缪尔逊认为，现代社会经济既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纯粹的统制经济，而是混合经济。各种经济利益形式的综合要以私人利益与政府利益的结合为核心。个人经济利益要通过计划与市场的共同作用才能够综合成为社会经济利益。

从斯密经济学到萨缪尔森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利益的综合程度就总的趋势看是不断提高的。由上可见，不同时期或不同国家经济学的差别主要不在于是否研究经济利益，而在于怎样研究经济利益的综合。这是因为，第一，经济利益的综合程度根本上决定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所能实现的经济利益的综合程度亦越高。第二，经济利益的综合程度和综合状态还决定于一定的经济体制，相同或相近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由于不同的经济体制也会有不同的经济利益的综合程度和综合状态。第三，不同的经济学家往往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有不同的研究任务，因而，研究经济利益的综合也会选择不同的角度。

提出综合经济利益范畴,既是以往经济理论发展的‘自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的要求。

首先，综合经济利益范畴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任务创新的要求。

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任务是要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给工人阶级提供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与这一任务相适应，阶级利益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阶级利益侧重于公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任务，在萨缪尔森看来，主要是探讨如何以混合经济利益为核心改善经济运行的状况实现经济增长，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侧重于效率。

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任务是什么？它既不同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有别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不仅要研究如何实现经济的有序运行与稳定增长，更要研究如何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经济的有序运行、稳定增长和快速持续发展，要以将公平与效率统一于一身的综合经济利益为前提。研究如何在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基础上实现经济的有序运行和持续发展就是我国经济学的任务。

社会主义经济学任务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研究如何在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均衡与非均衡中实现经济的有序运行与增长。第二，研究如何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均衡与非均衡中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假定一个社会处理好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不涉及生产力，那么，该社会经济就处于有序的运行之中，但无发展；如果同时处理好了与生产力的关系，那么，便可实现经济在有序运行基础上的持续发展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即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为什么会出现均衡或非均衡状态？这是由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的分化与综合引起的：非均衡是由经济利益的分化的结果，均衡则是通过经济利益的综合的结果。总之，经济运行能否稳定、经济发展能否持续决定于综合经济利益能否实现。

其次，综合经济利益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对象创新的要求。

经济学的对象由其研究任务决定。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任务是从资本主义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的对立和冲突中透过现象抓本质，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波动、周期性危机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为工人阶级提供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因而把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规定为人与人的关系。虽然马克思也研究了人与物的关系，但他对人与物关系的研究服从于人与人关系研究的需要。

相反，西方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如何实现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的和谐与统一以保证经济的有序运行，并为改善经济运行向个人、企业和政府等经济主体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依据，因而就注重现象而回避本质。尽管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对经济学对象表述各异，但都把经济学对象局限于人与物的关系。虽然在研究中也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但服从于人与物关系研究的需要。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区别，恩格斯说得很清楚，在资产阶级看来是人与物的地方马克思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中的社会关系，而

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中的自然技术关系。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人与物的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表现形式；从自然技术关系的角度看，人与物的关系是物与物关系的表现形式。社会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以‘物’为媒介的,如图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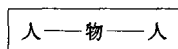


图 0-1

从它所构成的环节看，直接展示给人们的是人与物的关系。社会生产中的物与物的关系又是以‘人’为媒介的,如图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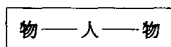


图 0-2

从它所构成的环节看，直接给人们展示的也是人与物的关系。当然在马克思看来,图 0-1 中的‘物’是物化的人,图 0-2 中的‘人’是人格化的物。由此可见，人与物的关系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物与物的自然技术关系的共同形式。人与人的关系是从中抽象出来的纯社会规定性，即通常所理解的生产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是从中抽象出来的纯自然技术规定性，即通常所理解的生产力。人与物的关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实现形式。不仅作为生产关系的人与人的关系通过人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而且上层建筑中的许多人与人的关系也是通过人与物的关系实现的。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客体的经济学，其对象显然既不同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但与两者都有某些共性。其共性就在于人与物的关系上。要把人与人关系的研究与人与物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既揭示经济关系的社会形式，又研究经济关系的物质内容。综合经济利益具有社会关系和自然技术关系双重规定性，可以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

这一要求。

0.2 综合经济利益研究的系统方法

理论的创新要以方法论的变革为前提。困难的不是提出理论新思想而是跳出方法旧框框。综合经济利益的提出和研究运用的是系统的方法。

一、综合经济利益的分析与综合统一方法

就方法论讲，当代东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大概就是分析方法了。分析的方法就是把一部整机拆零，又把每一个细部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置其余于“黑箱”之中。分析方法所体现的是一种线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复杂事物或复杂关系的性能等同于被简化还原之后简单事物或简单关系性能的直接相加；整体事物的性能等同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性能的算术和。与之相应的分析方法就是将复杂事物和复杂关系简化还原为简单事物和简单关系，将整体割裂为它的组成部分，然后分别考察这些被简化的事物和关系，最后将这些认识集中起来。恩格斯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①

分析方法对近百年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分析方法使我们所研究的世界与客观世界其余部分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毫不相关了。随着 20 世纪，特别是 20 世纪中叶科学的发展，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日益显露出来了。人们开始考虑为什么就不能把已经拆零的细部再组装起来呢？为什么不运用作为“分析”方法矛盾对立面的“综合”的方法呢？于是一系列把分析的方法和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18—19 页。

综合的方法结合起来的新的方法论，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纷纷问世。这是因为，研究和认识经济现象的客观过程，要求既要利用分析，也要利用综合。“分析是将现象、对象和过程分解成为几个部分和要素；而综合则是把这些部分和要素联成一个整体。”^①分析是综合的前提，“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②要在理论上再现丰富多彩的、有机的现实世界就必须在运用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运用综合的方法。

综合的方法就是将研究的对象纳入相应的系统之中去加以考察，并着重从结构和功能、整体和部分“内部”和“外部”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去把握对象的一种研究方法。综合的方法体现的是一种非线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只有把那些被简化还原之后简单事物和简单关系重新纳入它原有的复杂事物和复杂关系，把那些被割裂的部分重新纳入原有的整体时，才具有原有的性能。

提出、理解或研究综合经济利益就要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石墨和金刚石都由同一种碳原子构成。它们血统相同，品格却有天壤之别。石墨稀松、丑陋，金刚石坚硬、美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经济利益的具体形式就是那么几种，但是，各种形式经济利益不同的耦合会给经济主体带来极为不同的满足，各种形式经济利益不同的耦合带来经济运行不同状况和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经济利益的功能取决于综合经济利益系统的内在结构。

系统论把事物的各组成部分有机地统一起来，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多变量的考察。这是结合分析与综合方法同时进行

^①巴卡洛夫、谢列密特：《经济分析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6页。

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更侧重于综合。系统分析是综合指导下的分析。系统综合也不是把要素的孤立分析加在一起,而是以结构为中介,使各要素联结成一个整体,加以综合把握。也就是说系统综合始终与分析同步进行,以综合为起点,以综合为归宿。总之,系统思维是分析中有综合,综合中有分析,综合甚至居主与地位。

综合经济利益研究的系统方法,具体体现在综合经济利益的逻辑关系、历史关系、中介关系的研究之中,我分别称之为系统逻辑方法、系统历史方法和系统中介方法。

二、综合经济利益的系统逻辑方法

综合经济利益的系统逻辑方法是指综合经济利益因果关系研究中所体现的系统性。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综合经济利益系统方法,要求因果关系研究不仅走一条线,而且循一张网。

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由其研究对象所规定。不论什么时代,也不论社会性质有何不同,财富增长始终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不同经济学之区别,仅在于其对象界定的角度不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人与物的关系视为经济学的对象,而马克思经济学则反之,恩格斯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①若从与财富的相关性看,两者的区别不过是前者偏财富的物质内容,后者重财富的社会形式。但是,正是由于这一区别导致了它们对财富增长从而对经济发展缘由理解的根本对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人与物的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根源,而马克思则认为经济发展根本上是人与人关系的产物。这是就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区别而言的。不论是用人与物的关系还是用人与人的关系来解释经济发展,都需要或明或暗地借助于经济利益。市场经济的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186 页。

展使经济利益分化出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因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经济利益范畴，其中有些经济利益范畴社会属性较多，另一些经济利益范畴自然属性较多。如果用单一的经济利益范畴解说经济发展，容易使因果关系展示为一种线性关系，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

马克思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要素。但是，两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能在可能性上是生产要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①社会生产过程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客观经济运动中存在着物与物、人与物和人与人三个层面的关系。社会生产首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既不要用化学试剂，也不用显微镜，更不要用抽象力便可以直接感知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这一人与物的关系，而当“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有意识的物”。^②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又是物与物的关系；生产资料是其所有者的化身，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是资本家的物化，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是生产的物质内容，人与人的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内容。人与物的关系是生产的形式。不同的经济利益范畴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生产三个方面的关系进行抽象。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由其不同的研究任务决定它们分别侧重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同时，也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对经济利益的研究都是有所侧重的。显然，如果我们用单一的经济利益范畴来解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就会有所偏颇。我们不能仅仅从人与人的关系或仅仅从人与物的关系中探寻因果关系。而应该把物与物、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的研究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28—229页。

统一起来，而不能将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与物的关系置于视野之外或熟视无睹。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看，物与物和人与人是人与物关系不同视角的抽象。否定了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失去了纽带，人与人的关系失去了载体。

以上分析提示：（1）因果之逻辑关系不是单维式，而呈网络状。现实的社会经济运动所给人们展示的是一幅巨大的因果关系网络图，其中的各个纽结点都互为因果。比如，生产力的发展既有其自身的原因，即由生产力本身所内含的人与物和物与物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引起；亦有生产关系方面的原因。生产关系可以通过中介关系作用于生产力。同理，生产关系的变化可以由于自身的原因，也可由生产力的革命所导致。如果把思维再伸展至上层建筑领域，则因果关系更为复杂。（2）在因果关系中，根本原因不等于终极原因。根本原因之成立，须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为条件。根本原因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的转换而变成非根本的原因。反之，非根本的原因会变成根本的原因。若舍象时空因素去寻求终极原因，便无法再现那丰富多彩的历史和现实：许多国家生产力雷同，而生产关系不同；生产关系相同，而上层建筑相异——中世纪时法国、德国与英国具有相近的生产力水平，相似的生产力结构，为什么英国最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法、德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要比英国晚一个多世纪？为什么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的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恰恰在封建性很强的落后的俄国和中国取得成功？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停滞不前？中国在本世纪末为什么实现了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

以往我们也曾经用经济利益来解答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单一的因果分析提供的经济发展答案难以令人信服。综合经济利益研究运用的方法可以称之为综合的因果研究方法。它不是用某一种经济利益形式来说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而是着眼于各种经济利益的相互关系；它不拘泥于从生产力或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